

目录

1.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1.1“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向要求.....	1
1.1.2 银行业发展要求.....	2
1.2 研究意义.....	3
1.2.1 学术意义.....	3
1.2.2 实践意义.....	4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5
1.3.1 研究内容.....	5
1.3.2 研究方法.....	6
1.4 创新与不足.....	6
2.文献综述.....	7
2.1 审计委员会治理发挥相关文献.....	7
2.1.1 独立性.....	7
2.1.2 专业胜任能力.....	8
2.1.3 治理行为活跃性.....	9
2.1.4 审计委员会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10
2.1.5 审计委员会的间接治理效应.....	11
2.2 绿色金融发展必要性及可行性相关文献.....	12
2.2.1 绿色金融推动全产业实现“双碳”目标.....	12
2.2.2 绿色金融提升银行竞争力.....	13
3.理论分析与指标选择.....	14
3.1 审计委员会基本理论.....	14
3.1.1 委托代理理论.....	14
3.1.2 声誉理论.....	15
3.1.3 资源依赖理论.....	16
3.1.4 社会交换理论.....	17
3.2 自愿性信息披露相关理论.....	17
3.2.1 竞争性资本市场理论.....	17
3.2.2 信息传递理论.....	18
3.3 绿色金融基本理论.....	18

3.3.1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18
3.3.2 环境风险管理理论.....	19
3.4 审计委员会影响绿色金融的路径分析.....	20
3.5 评价银行绿色金融效果指标选择.....	21
3.5.1 审计委员会治理能力评价指标.....	21
3.5.2 银行风险控制评价指标.....	22
3.3.3 绿色金融评价指标.....	25
4.我国上市银行审计委员会与绿色金融描述性统计.....	27
4.1 上市银行审计委员会特征描述.....	27
4.2 上市银行绿色金融描述.....	28
4.3 国有大型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的描述性统计.....	29
5.案例分析.....	30
5.1 案例选择.....	30
5.1.1 案例介绍.....	30
5.1.2 案例公司的绿色金融业务.....	31
5.2 审计委员会特征对银行绿色金融影响.....	34
5.2.1 独立性.....	35
5.2.2 专业胜任能力.....	36
5.2.3 治理行为活跃性.....	41
5.2.4 审计委员会监督治理能力特征总体评价.....	43
5.3 银行绿色金融的反映.....	43
5.3.1 银行风险控制效果.....	43
5.3.2 绿色金融发展效果.....	45
5.3.3 排除其他原因.....	47
6.研究结论、不足与建议.....	48
6.1 结论.....	48
6.2 建议.....	49
6.3 不足与展望.....	51
参考文献.....	53
后记.....	57
致谢.....	59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61

1.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向要求

“十四五”期间前期由于国内国际局势影响，我国经济已呈现出下行趋势，该时局要求我们一方面把握好“十三五”期间的机遇，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在后疫情时代下进行“破釜沉舟”的大转型。该转型包括但不限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方面，但众多转型方向之中落实难度最高的当属“绿色经济”，因为该经济发展方向需要进行内生性改革，对于我国生产方式改革而言无疑是进行“大跨步”：因绿色发展理念要求的生产方式变革与诸如数字经济要求的传统技术创新生产方式变革具有本质性、巨大性的差别。该差别主要体现于价值实现过程中：首先生产方式的变革将带来成本的陡峭增长，其次成本增长将推动技术升级替代，最后才会形成生产方式变革产出绿色收益的结果。

纵观世界绿色经济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之一。截至 2021 年，中国的绿色金融业务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发展态势，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融资工具均实现量级增长：我国 2021 年末绿色贷款余额已超 15,900 亿元，同比 2020 年增长 33%，绿色贷款存量规模排名全球第一。与此同时，绿色债券业务发展不逊分毫：2021 年我国绿色境内债券发行量已达 6,072.42 亿元，同比 2020 年增长 180%。放眼整个亚洲地区，各国、各城市、各机构均在争抢区域绿色金融中心的称号，一方面市场数据表现了亚洲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正呈上升曲线，另一方面如若不借用数据工具、采取战略转型则难以提升金融影响力。

我国的大国体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但是本质上绿色生产体制改革所遇见的根源性问题仍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的重点。首先成本优化是生产体制变革中遇到的第一道难关，当前经济发展水平较 2019 年整体偏弱，绿色经济市场中的参与者，无论是由于内生推力还是资本市场拉力，均被制约着改革进行。其次，尽管世界银行目前大力倡导进行规模化绿色投资，但对于当下的世界宏观经济运行阶段仍存在一定挑战性。因此，作为引领社会资本流向的金融机构，其未来战略方向、治理水平、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均需要更上一层楼。

1.1.2 银行业发展要求

除了迫切发展绿色经济、绿色产业，国家对提供绿色金融服务的银行业的风险控制能力和内部治理建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央行也配套绿色金融出台了相应的评价方案。

一方面，中国银保监会于 2021 年 7 月公布的《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对比 2013 年 7 月公布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主要变动方向体现为：

（1）对于良好公司治理的要求由 6 点组成扩大为 10 点组成，并新增提出需建立良好的利益相关者保护机制以及表达出对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关注。

（2）对独立董事的要求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优化合并，重点描述了在新时代背景下独立董事有关保证公司治理方面的职责与权限进一步规范、扩大的想法。

（3）突出对专业委员会的设立情况、成员组成、工作方式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4）在利益相关者与社会责任方面，突出 ESG 观念在银行内部的建设以及在经营宗旨方面的融合体现，包括但不限于关注环境保护、维护社会声誉、营造社会关系等。

（5）在信息披露方面也不仅仅局限于“G”所涵盖的财务数据、法务信息，而是将披露范围辐射至与各方面重要信息，包括要求银行业需主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6）提出对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方面细化要求，将银行公司治理的重点关注也转移至风险导向原则。

另一方面，2018 年 10 月第五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为新《公司法》）在公司治理方面首先对董事会的职责更加明确化，由“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更新为“股东会职权之外的职权”，由指定式权责向排除式权责移动，也可以理解为新《公司法》赋予了董事更多的潜在权利。其次，在管理层方面，新《公司法》还明确新增了有关审计委员会篇幅表述及任职要求，有限责任公司中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监事或监事会的存在，这也显示出了新《公司法》对于审计委员会可更独立、更尽责、更勤勉地发挥监督职能而寄予厚望。

2023 年 2 月《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中也在具体章节进行了细致优化，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细化对组织结构的要求以提升公司治理效果体现、明确股东可以查阅会计凭证以切实履行对管理层监督的权利。由于 2018 年版《公司法》对

审计委员会可替代监事会的职责专门提出，2021 年 12 月的修订草案一审稿中也在此基础上对审计委员会成员的内部兼任情况提出了要求，并进一步明确独立董事占审计委员会比达半数以上时可不设立监事会。本次二审稿中指明依规设立的审计委员会可替代监事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多重形式主义监管，暂时简化了对独立董事占审计委员会比例的要求，并规定审计委员会最小行权规模且在比例上要求独立董事须过半，同时比例过半的独立董事专业背景中至少一位来自会计专业。

通过对《公司法》多次的演变可以看出，在资本市场逐渐走向成熟的背景下政策首先明确对投资者的保护并进一步规范市场中参与方的公司治理体系，其次首次明确表明审计委员会在内部监督职能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再一方面，国有六大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虽已占据大部分绿色金融市场且完成了绿色金融治理架构的初步搭建——形成了由董事会、委员会、管理层、执行层分级执行的监督治理架构。上交所针对“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表示，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框架、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低成本、长期限的资金是有序且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仍需进一步强化董事会和专业委员会的绿色金融业务决策职能，以全面提高战略站位和业务发展前景性；对管理层和执行层的协同效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加强协同配合性、决议高效执行性，更要求稳健经营和绿色金融业务拓展两手抓。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当前绿色经济发展需要已成为国家发展主旋律，顶层设计中已推出诸如《绿色银行评价实施方案》、《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方案(试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等文件，这些文件均展现了中央对绿色金融业务发展的重视，更侧面展现了绿色经济理念已经成为全产业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银行业公司治理的研究中，目前已有较多有关审计委员会特征的文献并贡献了突出的研究成果。面对银行业的绿色发展需要，审计委员会特征对绿色金融的影响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中对审计委员会专业任职背景的多元化要求也体现了当前内部治理机制的升级，需针对数字科技、

绿色金融等发展需要进行软性人员配置的升级和硬性制度的完善,以提升治理效果、信息披露和战略目标。

同时有关审计委员会的文献中,有关前端影响因素和后端治理效果的研究大多局限在直接效应中,有关产生非预期间接效应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有待提升。

本文在“3060”¹目标背景下,对主打“绿色银行²”的银行审计委员会特征进行研究,希望能对未来绿色银行内部审计委员会升级建设的研究文献提供参考意义,以帮助后来者实现审计委员会升级带来的信息披露质量提升,从而达成治理效果转变,进一步丰富我国银行业绿色金融实务的相关文献。

1.2.2 实践意义

当前中央、国务院、银保监会等已配套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绿色金融体系的政策及金融机构需积极发展绿色金融的指导意见。追溯至 2016 年,人行等七部委早已开始规划绿色金融发展步调并出台《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把绿色金融纳入国家战略体系,该指导意见提出:首先推动银行业积极发展绿色信贷,具体切入点包括绿色信贷产品开发、绿色评价机制规范等;其次规范绿色金融发展的产品界定标准、信息披露制度等;再者降低准入门槛,包括允许设立绿色产业基金及运用 PPP 模式盘活社会资本;最后鼓励开拓各类绿色金融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绿色保险业务、碳排放市场交易、碳中和债券等。

但非国有大型银行受制于自身影响力、市场规模、成本效益因素等难以进行突破化转型。但“十四五”目标下可持续发展已箭在弦上,银行业作为掌握稀缺资源的导向性行业需要且必须大力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一方面,银行业有义务统筹社会资源流向至目标领域,包括科技创新和低碳发展,而“贴绿”“漂绿”等企业的存在正在打乱绿色资源配置市场秩序;另一方面,银行业提供的服务具备较强同质性,基于提升综合竞争力角度也有必要进行绿色金融业务开拓。其次,银行业的首要任务即基于风险导向进行管理控制,绿色信贷当前属于国家大力推行的方向之一,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及早的进行绿色信贷风险管理规划也有利于银行的全面健康经营。再者,绿色金融业务本身起步较晚、披露程度较弱,若银行积极开展绿色金融并履行绿色金融相关数据披露,在一定

¹ 2021 年 10 月 24 日,中央及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并指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力争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² 该词首次正式出现于《中国金融》中《政策性银行打造“绿色银行”探索》一文。

程度上也辅助其增强竞争力和社会形象。

综上,进军绿色金融显然有诸多好处,但也对银行配套治理结构高效“变绿”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本文研究主打“绿色银行”名片的兴业银行,研究其十五年前布局绿色金融的战略定位以及其占领绿色金融领先地位的内部管理体系搭建方式,不仅对想开拓绿色金融板块的中小银行业具备一定借鉴意义,同时也希望研究审计委员会通过信息披露的中介变量进而影响绿色金融的价值路径,具备一定的时代意义。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介绍绿色金融亟待发展和《公司法》对审计委员会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并基于此提出研究意义。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阅读了有关审计委员会特征及其治理作用发挥的文献、绿色金融对银行业的诸多好处及当前困难的文献,并着重讲述审计委员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品创新等研究成果以及审计委员会通过增强信息披露来影响银行价值的路径。

第三章,理论分析。本章着力研究审计委员会通过声誉信息、资源依赖、关系网络来积极履行监督职责的理论及绿色金融发展和其对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理论。

第四章,描述性统计。对当前上市银行业的审计委员会特征与绿色金融评价表现、绿色金融相关披露进行分析,探究审计委员会各项特征与高质量绿色金融发展的关联关系。

第五章,案例研究。通过整理我国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公开披露信息,研究作为公司治理一环的审计委员会其特征对绿色金融发展质量之间的关联关系。

第六章,研究结论及建议。总结上述评价指标的正负相关关系,最后基于当前鼓励绿色金融大力发展的背景下,对监管机构和尚未大力转型的商业银行提出几点监督管理和内部治理的建议。

1.3.2 研究方法

（1）归纳演绎法

本文查阅了国内国外文献，总结了国内外关于绿色金融发展、审计委员会特征对治理效果的影响和审计委员会未来职能方向的文献观点，逐步完善了基础理论认识并归纳出适用于本文的相关评价指标，随后在既有的理论上做一定的整理和推衍，形成本篇文章的观点。

（2）统计比较法

本文对截至 2021 年末上市的银行业审计委员会特征及绿色金融业务进行描述性统计，从大样本中探求审计委员会特征和绿色金融评价指标间的关系。

（3）案例分析法

本文通过对兴业银行个案进行分析，手工整理 2010 年至 2021 年数据审计委员会治理能力、银行风险控制能力、绿色金融发展评价指标，结合趋势比较和排除重要外部环境因素，最终提出审计委员会特征协同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结论和建议。

1.4 创新与不足

当前众多对银行审计委员会的公司治理效果的研究仍局限在传统信贷业务中，本文选取了国内首家“赤道银行”为案例公司，研究审计委员会通过信息披露为中介因素所产生的间接治理效应，研究审计委员会特征对深耕绿色金融的商业银行产生影响的路径，并为实现“3060”目标的金融机构如何进行内部治理结构转型提出“绿色”建设建议。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本文参考数据源于手工整理的上市银行业公开数据，其中包括未经第三方审计的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本文已经默认假设所收集的公司披露财务信息、绿色金融数据、银行风险承担数据全部真实有效，因此本文搜集整理的资料在行业对比和趋势对比的分析研究上可能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2.文献综述

2.1 审计委员会治理发挥相关文献

从外部审计师角度，2020年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和2020年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职业道德守则》均对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有明文表述，其应当在履职过程中做到客观公正、诚信独立、专业胜任、良好职业行为和信息保密。其次，从内部审计师角度，《中国内部审计准则第1201号》文件有关内审人员职业道德要求的表述也明确指出内部审计师也应秉承上述良好职业道德。

作为董事会下设专业委员会之一，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监督内部审计、协助外部审计、建立起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间的沟通桥梁、审查内部控制制度等。Kalbuana *et al.* (2022)指出审计委员会规模与企业趋于可持续性保持正相关关系，Nguyen (2022)指出审计委员会有效性可提高银行效率，Sri *et al.* (2022)认同该观点，但也指出审计委员会可能不会直接约束管理层的冒险行为，因此仍需要银行制定一定的治理环境帮助提升审计委员会效力。同时观测我国实情也有相同的影响作用，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等文件指引均要求审计委员会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专业知识层面需要一定的胜任能力，同时还需要保持勤勉尽责维护股东权益，保持公司免受委托代理等传统问题的困扰。并且赵放等(2017)也指出当前审计委员会对信息披露质量的职权范围不应仅仅局限于观测且纠正可操纵性应计，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与否和其信息质量高低的评判该部分履职效果的标准之一。

2.1.1 独立性

从独立性角度，Klein *et al.* (2002)指出审计委员会由较多外部董事组成时将提升企业合规健康经营过程。首先，刘彬(2014)指出独立董事占比多数的审计委员会将更不受管理层影响，因此将更能履行执行董事为主的管理层应尽的有关内部控制建设和财务报告披露方面的部分义务。潘婉均(2018)赞同审计委员会越独立越能保持不被管理层约束、控制及动摇，从而在内控治理角度保证对外披露信息公允，体现为李斌和陈凌云(2006)所述的降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而发生的年报补丁概率；同时吴奇峰(2022)指出审计委员会

独立性在管理层妄图通过信息不对称操纵应计利润时会更大程度增强与外部审计师沟通进而降低审计风险，增强外部治理能力。其次，“经理人市场”背景下，潘婉均（2018）指出审计委员会中的独立董事更关注自己的职业声誉，因此会通过履职尽责维护自己的职业口碑。综上所述，王守海和李云（2012）首先肯定了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特征将会提升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效果，其次也承认若存在管理层影响董监高提名任命，那么将会使得审计委员会的独立监督效能大打折扣甚至形同虚设。因此改进和营造有效运行的治理环境是审计委员会维护独立性的根本，这对公司治理有效运转、信息有效披露至关重要。

2.1.2 专业胜任能力

从专业胜任能力，潘珺和余玉苗（2017）通过对上市公司进行实证考察也证实了审计委员会中会计审计实务经验的专家越多、熟悉会计准则的成员越多，越能提高财务信息可靠性，同时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及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影响力越大，越能推动审计委员会发挥治理能力。除了审计委员会的财务专长属性与治理效应有正向关联，Krishnan *et al.*（2011）还研究了审计委员会成员财务和法律混合专长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指出由财务和法务专家同时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将可以呈现出“1+1>2”的监督治理效果，可以在监控财务报告质量过程中相辅相成。Cohen *et al.*（2014）更是指出审计委员会中既有财务专家又有行业专家构成复合人才队伍时，也能提高财务报告过程监控的有效性。

除了业内对“专业胜任能力”的传统理解，随着银行业不断进行金融业务创新，包括但不限于助力科创经济、绿色经济、蓝色经济等融资产品推出，行业法规监管不力、政策指导推行滞后、管理人员自身能力受限单一等内外问题均制约着金融业务创新的进程，在不断推进“十四五”目标的过程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不断凸显。Cheung and Chung（2022）指出审计委员会的“专业性”的定义不应仅仅局限于具有会计知识和经验的会计专业知识，其广义定义还包括非会计财务专业知识，例如监督或环境治理经验。因此，在应对绿色金融逆向选择问题中，王韧（2021）认为从人员配置角度，从事绿色项目的信贷管理全流程人员需要较强的行业背景知识以规避“漂绿”企业，而不仅限于通过环保证书、相关行业协会认证材料、企业提供的材料等进行确认甄别，从而通过某种资源配置调整的方式减少社会“漂绿”现象；另一方面，需正视金融机构难以切实做到绿色资金全流程的系统性监控而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需要设立完整业务流程控制，并由审计委员会不断进行内控制度补充，切实把握市场战略走向和保证稳健

经营。

随着“双碳”目标任务的推进，国务院提出《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主要涵盖绿色信贷、绿色融资工具、绿色保险产品建设，该意见指明实现“双碳”目标要完善政策机制，在绿色低碳发展领域有望继续推出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等，在绿色金融领域要保证积极发展并做到有序推进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张峰（2021）一方面肯定了绿色信贷业务开拓创新将进一步扩展商业银行业务布局，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尚未配套完善法律监管的绿色信贷业务给银行的风险控制方法、经营管理过程等治理手段的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因此在各战略部门、业务部门、监管部门等培养复合型的绿色金融人才就至关重要，可推动绿色金融业务“三查”工作地顺利开展，进而构建符合本行实情的绿色信贷发展的银行治理结构。

李云燕（2017）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控制绿色信贷业务的信用风险方式之一为在商业银行运营过程中采取绿色信贷信用风险控制措施及细化在内部控制过程中加强对绿色信贷业务的监督措施。杨旸（2021）认为银行审计委员会应充分认识到银行内审部门发挥“第三道防线”的重要作用并积极且充分地整合各类内部审计资源，以进一步帮助银行建立重要的业务内审制度，帮助实现内部控制针对化、业务管理规范化的目标，进而进一步促成以下目标：加强对绿色金融体系构建、重大绿色政策措施落实、绿色信贷业务绩效等方面的审计力度，加大常规审计、专项审计等审计项目中对客户评级、授信情况、贷后管理、风险分类等各环节审计分析力度，揭示潜在风险、对趋势性风险作出风险预警提示，全面揭示绿色金融产品的各类风险。闫鼎华（2019）提出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加强与行业协会、能源审计机构、ESG 咨询公司等合作，提升对相关产业发展和技术路线的了解，增强治理能力和经营能力。

因此，不管是《公司法》的公司治理角度要求内控管理的监督职能扩大升级，还是当前绿色产业对银行战略决策实施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要求提升，都对“挑起独立监督职能”的审计委员会提出了更高要求。

2.1.3 治理行为活跃性

从治理行为活跃性角度，通常认为专业委员会是董事会下设为专业化分工理念服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各专业委员会有明确的职责划分，而薛有志等（2021）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审计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特别是战略委员会交叠任职时会形成董事会内部兼任网络结构，该结构衍生的信息溢出效应和资源溢出效应可以帮

助专业委员会成员降低战略讨论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进而提升各专业委员会的监督效率、降低监督运行成本。Sun and Liu (2014) 针对银行业也指出审计委员会成员任期较长也将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实现有效的风险管理。Zhang *et al.* (2022) 指出当一家公司具备降低风险管理的激励措施,其管理层的经营决策会更趋向于进行资本交换。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当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已经在较高水平,其董监高会更活跃地进行社会活动。

但委员会成员兼任独立董事数目也并非越多越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中明确限制了独立董事兼任其他公司独立董事数量最多不超过五个,其目的在于确保独立董事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充足经历参与公司治理过程,以有效履行监督职责。然而李刚等(2022)通过实证研究也指出当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任职背景不同能产生差别性监督效果,进而以更复合更独特的角度判断决策,而同方向任职背景的审计委员会也可以更专精地为公司决策提供建议,由于同方向但不同行业不同公司体量的工作背景使得审计委员会具备更丰富的实操专业以在履职过程中做到精准捕捉内控缺陷信号并及时采取适时的更正措施,进而帮助企业提升内控制度在不断纠正的量变过程中实现质变,还可帮助公司在行业竞争中形成更清晰的市场定位和战略规划。进而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职能和独立董事的管理职能协助董事会从不同角度对重大问题进行全面分析,从而推动董事会做出更加合理的经营决策,促进公司长远发展。杨赟幸(2023)进一步研究了内部治理结构对自愿性信息披露³的关联关系并发现董事规模、独董占比都对自愿性信息披露起到正向相关作用。

2.1.4 审计委员会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明健全企业内部制度才是我国经济市场长远发展的关键,在外部监管日趋严格的背景下,企业要想获得更根本的竞争力只能依靠提升内部监督机制并且不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一方面可以防范监督不力导致的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信息披露日趋完善以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而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体现为两方面:一是作为参与公司治理过程的影响因素,二是成为产生经济后果的治理效

³ 自愿性信息披露包括盈利猜测信息、社会责任环境保护信息、高层次经营性数据、前瞻性信息等。该词源自2018年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指出的“鼓励上市公司除依照强制性规定披露信息外,自愿披露可能对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决策产生影响的信息”

应。徐海峰等（2023）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审计委员会对公司的直接效应体现于：提高财报质量、加强信息披露，除此之外，审计委员会还有通过降低股价风险、提升资本配置效率等间接治理效应。

谌嘉席和王立彦（2012）早就提出审计委员会特征对信息质量的影响作用于信息生产环节，体现于信息使用环节对决策者的影响。王积田等（2023）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十年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审计委员会的学术经历通过信息披露质量提升的中介作用以有利于抑制公司的违规行为发生概率。Chemingui *et al.*（2023）通过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不仅能通过专业性来实现有效税收，更能帮助实现企业社会责任披露。除了审计委员会以学术能力为代表的专业性特征会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海归属性、关系网络地位等也会成为影响因素。周泽将等（2020）通过2008-2016年资本市场的数据表明审计委员会海归特征显著提升了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张川等（2022）指出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在关系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将会提升内控质量、降低外部审计报告错报率、提高审计委员会履职勤勉度，从而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张志红等（2022）将管理层的文本语调操纵和可读性操纵行为均纳入MD&A⁴信息披露研究范围中，并指出审计委员会相关财务专长越强，管理层策略性披露行为越少，同时提出应适当细化我国审计委员会职能，以切实推动企业内部治理水平提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表现之一，通过在信息披露生成的过程中采取一定的监督介入，从而影响信息披露所带来的企业价值反映。

2.1.5 审计委员会的间接治理效应

审计委员会除了有显而易见的直接治理效应，如提升内控制度完整性、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高内外部审计质量，审计委员会非预期产生的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作用原理也同样有着密切关系。该部分间接效应可以简述为改善资本市场环境、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等社会效应方面（王雄，2018；王奇杰，2011）的体现。徐海峰等（2023）通过文献整理认为，审计委员会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发挥一定监督作用，从而帮助企业提升环境治理能力，进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⁴ Management's Discussion and Analysis，译为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多用以描述预测公司业绩的重要且前瞻性却非财务性的信息，且不受GAAP国际规定的约束。

2.2 绿色金融发展必要性及可行性相关文献

2.2.1 绿色金融推动全产业实现“双碳”目标

王翔等（2021）通过整理 2006 年至 2021 年文献并支持了绿色金融、绿色金融体系建立等战略布局的确会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证监会和发改委已针对绿色债券发行推出了《绿色债券目录指引》，以进一步规范发行主体及募投资金使用方向，但当前绿色债券发行窗口逐步规范收紧。Sangiorgi and Schopohl（2023）也指出缺乏足够的绿色债券供应是绿色债券市场增长的主要障碍之一。

绿色信贷仍旧是我国绿色经济起步阶段的主要绿色金融融资方式，但受制于绿色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的阶段特征，可能在部分省市存在绿色信贷反而抑制绿色技术发展的情况，但从国家整体宏观角度观测该矛盾已明显渡过低谷期。刘海英等（2020）指出尽管我国绿色信贷水平和绿色技术的关系在 2014 年前出绿色信贷水平高反而会抑制绿色产业技术的显著“U 型”左侧趋势，但随着我国绿色金融配套法规政策的指引已基本越过“U 型”谷底：现在呈现绿色信贷水平不断提高会促进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并更深入挖掘造成该结构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绿色信贷发展的水平处于低位，难以充分发挥研究假设水平，即以绿色信贷为主赛道的绿色金融对经济结构转变发挥支撑与引导的资金支持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绿色信贷投向不仅限制可持续发展产业，还从资金支持来源上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绿色约束。Shen *et al.*（2023）指出在不确定的政策制定背景下已影响了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而众多利益相关者会选择将碳资源也纳入风险考量中，因为这部分的短缺与不足将会加大财务限制。

综上，绿色信贷和绿色经济的因果关系目前已回归理论结论，在全产业都想进行绿色转型、搭建绿色声誉品牌的背景下，顶层设计应进一步推进落实绿色信贷政策、创新绿色金融体系，资本调配者应进一步提升绿色信贷管理水平、完善绿色产品布局，以达成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除此之外，杨熠等（2011）肯定了绿色信贷、绿色再融资政策背景下，绿色金融的蓬勃发展对公司治理的强化的正向作用，同时也指出公司治理对绿色金融的逆向作用，即公司治理良好也能帮助全产业实现绿色金融、绿色产业目标。

2.2.2 绿色金融提升银行竞争力

因此,当前阶段支持以绿色信贷为主的绿色金融不仅能拉动绿色环保行业蓬勃发展和传统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为整个“双碳”目标铺垫良好的融资基础,还能改善银行业内部竞争关系,增强信用风险管理。

在经济下行、竞争压力全面推进的金融体系内,金融创新成为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进经济体系转型发展的主要动力。郇栋玺和项后军(2020)指出我国银行业内由于业务同质性强、政策限制不能打价格战等因素导致了银行业当前竞争局面亟待转变,急需通过创新业务产品、改进风险管理模式等以提升综合竞争力。李双建和田国强(2020)指出理论上银行竞争格局将除了会直接决定各银行的盈利能力和稳健经营能力,还会影响全行业的商业生态环境。宿伟健等(2020)也指出大量的中小企业作为创新的重要主体,由于银行业内存在一定的垄断市场环境而难以通过获取传统信贷补充扩张现金流,进而难以引进先进技术或进行生产技术创新,更有甚者由于融资门槛限制或成本限制等因素导致难以获得资金而被迫搁置或终止技术创新项目。尹振涛和李泽广(2021)指出银行业信贷资产结构变化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不同银行的信贷资产配置技术,而同行业企业间技术水平的差距制约着行业竞争关系。

对此,王宾莹(2022)表示绿色信贷的确将成为商业银行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主要途径,并且绿色信贷贷款余额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有正向的促进效应。一方面,从绿色金融表现和银行竞争力角度,高晓燕和高歌(2018)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证明了商业银行重视绿色金融的战略站位除了传达出积极执行国家政策、践行国家绿色发展理念的信号外,还可以综合提升环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潜在竞争力三方面组成的银行竞争力。宋泾漂(2021)通过对四家绿色信贷业务体量较大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进行实证检验也证实了绿色信贷规模发展确为提升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手段之一。

另一方面,从战略决策制定和绿色金融表现角度,文书洋等(2022)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并基于改善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角度提出,银行等金融机构转变“绿色化”理念建设及投资决策是发展绿色金融的根本,只有统筹战略制定的管理层级秉持绿色决策理念,才能促进实现经济绿色发展的目的。

尽管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的诸多好处已在理论及实操中明显体现:降低成本、提升声誉、控制银行市场风险,但是绿色信贷业务究其根源仍旧属于信贷业务,况且目前仍旧属于绿色金融市场及配套监管政策推行的起步阶段,绿色

信贷业务的根本信用风险机制也逐步显现,丁宁(2020)表示面对此前遗留的“漂绿”等不合规行为,一方面银行作为贷出方,应在绿色信贷的事前审批步骤中加大对绿色信贷信息披露质量的审查控制,即从源头上防治绿色金融资源低效率配置;另一方面银行作为盈利性金融机构,应尽快建立健全内部绿色信贷管理流程,加快转型组织架构等配套绿色转型,完善内部控制的配套升级,以把绿色信贷业务的标准化运行纳入全流程管理过程中并进行实时监督、持续优化。

3.理论分析与指标选择

3.1 审计委员会基本理论

3.1.1 委托代理理论

审计委员会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企业经营传统的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代理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于二十世纪 30 年代提出,企业所有者为保证剩余价值追索利益最大化而向公司经营提供各类资源、搭建交易关系,但随着业务规模的提升也会受制于专业知识不足、精力有限等原因而无法事事亲力亲为,也由此剥离了日常经营管理权并由此衍生出管理层。该理论指出导致公司有可能不能做到“越大越强”的原因是由于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会面临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的“两权分离”困局。

相较于委托人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价值最大化,委托人作为理性经济人也会考虑最大化自身可获取价值,即公司利润最大化,该种价值追求方式也必然会导致受托人利用信息不对称而进行一些短视性经营行为,从而提高职位价值财富。委托代理过程前因为事前的财务管理目标不同而衍生出“道德风险”,委托代理后由于信息优势而衍生出“逆向选择”风险,这些都会使得委托人利益受损。因此,委托人建立了契约关系、“代理人市场”、股权激励等激励约束手段,以有效环节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董事会中下设专业委员会中的审计委员会作为一种内部监督机制,在化解受托人利用信息优势损害公司利益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其发挥监督职能可促进管理层与所有者追求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保持协同来开展日常经营活动,从而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升战略适配可能性和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在外部监督方面,根据中注协发布的《商业银行审计指引》精神,审计师应基于风

险导向理念，针对银行业产品业务创新多、数字信息难理解、操作系统复杂、监管要求严格等特点，强化内外审计实施的整合度。由此可见，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工作中整合内外审计监督职能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有效的审计委员会还可以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改进内控合规流程、完善风险管理体系等减低高管机会主义行为，进而维护股东所有者权益。此外，相较于大股东，中小股东更有可能受到委托代理的迫害，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职能还为战略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包括但不限于内部控制、配合战略定位进行风险导向重点转移，进而提高银行全流程效率，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损失。

中注协《商业银行内部审计指引》除了对外部审计有所要求，同时也明确出审计委员会应尽职督促内部审计保持独立性、提升履职有效性。审计委员会发挥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监管职能应围绕在以下方面：（1）遵守法律法规要求、落实监管规定；（2）促进商业银行搭建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风险管理体系等公司治理框架；（3）促进整合内外审计工作、提升履职效率。因此，审计委员会作为“逆向选择”激励约束手段之一，评判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一方面要基于企业所有权拥有者角度以直观经济指标等考核评判分析其监督职能履行效果，另一方面要基于审计委员会自身特征的滞后反映角度进行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履职活跃性的优化升级。

3.1.2 声誉理论

声誉理论把声誉看做一项包含过往信息的资源而侧重描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对待该类资源产生的信息流的传播和循环的路径体现。而声誉信息流之所以成为潜在重点关注的资源因为其通过降低信息传递环节中产生的信息扭曲成本，进而降低交易总成本、提升交易成功率。声誉信息的广泛研究也衍生出了声誉机制理论，该理论在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均有多种说明。在经济学领域，该理论在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方面有突出作用，即通过引入“代理人市场-声誉”模型，认为过去的经济绩效会影响管理层决策，借用“时间性”制约理念提升机会主义行为成本。在管理学领域，该理论以马斯洛需求理论为切入点，认为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诸如自我实现、尊重需求、社会需求等会成为管理层的激励手段。

声誉理论的基础是声誉，而声誉产生于社会网络中，因此在广泛的学术研究中发现当独立董事位于声誉信息流或社会关系网络中心地位时，其专业口碑和财富收入均处于较高水平。结合我国独立董事市场现状，发现独立董事难以从固定薪酬为主的薪酬制度中获得履职动力，因此专业口碑、声誉地位成为了激励独立

董事履职尽责的重要影响因素。马建威等（2013）指出审计委员会的多重任职将有助于形成高效信息传递通道，有助于及时获取企业信息并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度来提升治理效率。

一方面，公司也将通过关系网络形成的声誉效应提高审计委员会的资源获得能力，再者社会关系网络领先地位衍生的优秀行业口碑可以帮助独立董事获得更多的潜在合作机会、降低当前任职产生的机会成本、提升自我满足效益，进而提高了独立董事履行监督职责中保持独立性水平的可能性。而独立性水平是审计委员会保证履行监督财务报告、保证内部控制各流程合规义务的基础要素，该要求不仅从“实质性”和“形式性”两个角度强化了独立董事需客观公平公正的履职观念，更弱化了迎合管理层思维的可能性，同时也有助于独立董事勇于对管理层决定提出否定票、构建约束管理层短视行为的内控制度，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帮助全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的监督治理能力。

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网络领先地位的独立董事可能因为其积累的行业口碑而成为行业标杆，进而会因为声誉价值受到更高的潜在风险。上市公司因财务报表数据真实性、公允性、及时性等出现问题而导致利益相关者遭受损失，声誉市场由于谨慎性反而会对高声誉的独立董事提出更高的质疑，此举将使得其长期积累的声誉价值顷刻内遭受巨大损失甚至化为乌有，例如恒大公司和许家印教授的故事。而这一巨大的潜在成本将会激励独立董事在履行其监督职责中更为谨慎和勤勉。其谨慎性体现为对财务数据真实性、准确性的确认，其勤勉性不仅体现为审计委员会参与治理频率中，更能体现为其在履职过程中会主动寻求相关信息流并积极分享当前战略规划下企业应改进的经营管理方面短板，从而提高审计委员会履职效率，降低管理层机会主义发生概率，提升全面风险管理水平。

3.1.3 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是会计四大假设之一——持续经营的重要理论基础，该理念认为企业为长久生存、持续获利会积极主动吸引周边高质量资源，而资源并非具备所有权属性，因此会在建立合作、竞争关系网络的企业间流转。企业为了实现行业环境中资源的量级增长会积极与对手方进行资源交换行为。不仅所有者会为了剩余价值最大化而进行资源交换，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也会为了“代理人市场”中良好的声誉价值而进行资源交换。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审计委员会作为兼任的专业委员会，其独立董事通过在不同行业、不同竞争地位等特征的企业交叉任职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将会帮助其在

履职过程中更好地推动企业实现议价能力和主体价值提升。就议价能力提升角度，审计委员会中的独立董事通过任职产生的关系网络可以产生“权威效应”，该效应将有助于提升审计委员会与上下游管理层执行层的统筹议价能力。可表现为具备社会关系网络领先地位的特征的独立董事常被贴上专家权威的标签，这使得其在履职过程中具备更高的话语权，其提出的监督管理建议将更有可能获得管理层广泛认可。同时，社会关系网络处于领先地位的独立董事还可通过其对信息流等资源的掌控使得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被广泛传播，从而实现“代理人市场”的约束作用。

3.1.4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在社会组织关系中，双方的交往行为是出于一个相互受惠的交换过程。但由于双方是基于利益角度，只有极大可能获得预期回报才会维护该类资源，这也导致了社会交换具备不确定特征。中国的典型关系式社会标签起源于我国前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固有限制。在这样的生产模式背景下，非正式关系所带来的裙带资源成为了正式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力，也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巩固了中国式关系社会的地位，形成了中国人际交往或交易往来的显著特点。在实务中，高管的社会关系也已成为企业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主要包括亲属血缘、校友和同事关系等。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管理层在行使经营权过程中，会积极采纳具备专家权威特征、关系式社会特征的独立董事所提出的监管建议并尽责落实，为维护其潜在的社会关系，进而充实企业经营过程中可利用资源池。其次，管理层也会减少具备专家权威特征的独立董事履职过程中的障碍，包括但不限于“职权不符”等降低监管话语权行为，以建立和巩固关系式社会的稳定性，以形成管理层配合审计委员会发挥监督职能的健康监管体系，提升企业全面风险管理能力。

3.2 自愿性信息披露相关理论

3.2.1 竞争性资本市场理论

该理论认为资本市场中存量资金量为固定值，公司为了筹集维持其基本运转或扩张经营的资金资源会自主产生自愿披露非必要性信息的内生动力。

审计委员会提升公司治理的渠道之一就是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在当前资本市

场进入升级转折区间，利益相关者对非财务信息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加，例如信用评级中已经加入了 ESG 表现作为其他外部因素。而限制投资者投资行为的一大重要因素则是信息不对称，当公司信息越透明公开，公司的战略实施程度才会越详细，公司的社会形象才会更好，才会实现增加市场价值或增强社会竞争力的目标。

3.2.2 信息传递理论

信息传递源自信息不对称，而之所以存在信息不对称是由于当前市场不是半强式或强式有效市场，因此信息质量和信息的目的均会影响着信息披露的动机和效果。根据信息传递理论，具备高质量治理效应的公司有动力自愿披露那些未强制进行审计但却反映公司真实情况的信息。一方面可以让众多利益相关者了解到公司前景的可行性和稳定性，进而减少投资者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另一方面，当市场众多参与者都主动参与到自愿信息披露的过程中时，市场和法律法规会逐渐对这部分自愿性披露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有更高的要求。审计委员会的作用体现于治理能力和信息披露，但是当前治理准则对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效率效果落实并不理想。因此，如何利用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生性发展促进社会整体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也是审计委员会未来的目标。

3.3 绿色金融基本理论

3.3.1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随着知识经济发展与全球化趋势转变，白钦先教授首次提出以金融资源理论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针对经济金融市场特定的扩展，该理论颠覆过往仅认为资本是种简单要素的理念，将金融要素视作稀缺资源、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因此通过对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实现经济结构改革在理论上是切实可行的。

该理论将金融资源首先分为了三层级：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金融工具体系组成的中层金融资源、通过整体功能性属性实现的高级金融资源。其次指明金融资源具有双重性特征，一方面作为稀缺的战略资源可融入可持续发展体系内，因此需要结合国家战略发展要求进行经济结构优化，以提升现代经济、数字金融、绿色经济等高质量经济方向存量规模；另一方面金融资源作为资本的衍生合集可

对其他社会资源产生配置效果，因此利用金融资源控制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成为了其潜在作用之一，因此需要按需及时搭建风险预警机制，需要利用金融资源的效果滞后性来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不稳定性，进而保证金融生态环境的健康。

由此可见，“十四五”目标的顺利完成不仅需要顶层战略的支持，也需要我国银行业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日常经营过程全程，不仅要涵盖金融业务开拓创新全程，还需要提升员工的绿色发展理念、提升对监督部门的社会责任要求。此举不仅从金融资源角度，还是金融可持续发展角度均可给商业银行带来诸多好处，一方面帮助商业银行更好地发挥该稀缺资源在经济体系发展中的作用、提升其战略定位，另一方面可以对内部监管部门赋予更深刻的“绿色”职责（如高质量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等）以由内而外地推动经济绿色循环，进而降低整个市场的系统风险。

3.3.2 环境风险管理理论

伴随全行业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银行所面临的各类银行环境风险也日渐加剧，对各类风险定向进行针对化、全面化管理就成为了保证并加强竞争力的基本。商业银行环境风险管理是以银行需控制规避的环境风险为导向提出的实现利益最大化所采用的管理理念。而当前商业银行的环境风险管理内容除了依据传统理念划分为：系统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

如下风险纳入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也迫在眉睫：（1）连带风险。连带风险基于资源依赖等角度，认为银行提供融资贷款业务时如未能审慎考虑污染行业面临的环境治理风险，其可能因为银行授信批准行为而连带地受到当地法律法规的处罚。（2）声誉风险。声誉作为一项稀缺且附加价值大的无形资产，其构建的关系网络和声誉信息流将会直接影响以投资者、债权人、消费者、上下游、政府为主的利益相关者对银行的态度和产出行为。（3）战略风险。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发展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阶段，发展绿色金融是当前我国推进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构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模式的必然要求。尽管在融资渠道方面，我国为鼓励“绿色”相关项目开启“绿色通道”。然而，在绿色金融业务产品创新、绿色金融存量规模扩张的背景下，“漂绿”行为带来频发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逐渐成为绿色金融稳健发展的巨大阻碍。一方面“漂绿”企业的贷后管理措施难以落实，另一方面绿色转型的贷款企业由于没能有效防范环境问题而导致产生巨额罚款费用或叫停其他代建绿色项目，这都会使得企业资金链断裂，从而给银行的绿色金

融业务板块带来损失性不良贷款，进而影响银行业乃至全行业对绿色经济的信心。

3.4 审计委员会影响绿色金融的路径分析

首先，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治理工作活跃度等履职特征通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展现其在内部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而良好的履职特征可以帮助提升财务信息透明度、降低盈余管理行为、减少风险成本损失等。除此之外，审计委员会在银行中也充分发挥了加强全面风险管理的职能。通过银保监会、人行等顶层政府机构设计的银行业评价方案、绿色金融指导意见等均能看出绿色金融在提升银行综合竞争力方面的突出作用，而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职能同样也会在主营业务板块之一的绿色金融业务有所体现。

本文认为，产生不良贷款和绿色不良贷款的原因除了受外部经济下行因素影响，还源自内部治理不完善因素：贷前绿色客户评估不到位及授信审批流程形式化、投后管理缺少针对性和动态分析及未能及时作出资产减值风险判断等。艰巨的外部市场发展环境也指明了要想交出满意答卷就需要内部治理发挥效用。在内控流程方面，银行内审部门能针对绿色信贷业务和绿色金融事业部等进行全流程监督管理并对绿金业务内控做出保障，审计委员会同时可以站在战略制定角度对绿金业务提供一定监督建议；从信息披露方面，审计委员会可以在保证财务数据真实可靠的过程中了解管理层对信贷风险的态度和改正举措，也可以了解是否管理层尽职将绿色金融战略中涵盖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产品数据公布，是否推进管理层高质量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等。而绿色信贷占比及同比增速表示着银行正贯彻执行绿色金融指引要求，切实帮助全产业做好绿色转型第一步。

审计委员会根据绿色金融指引要求不断培养多元化专业能力，将有助于促进内部审计团队对绿色金融业务的专业判断力和风险敏感度，进而推动银行内部绿色金融业务流程及制度制定的合理性和落实的有效性。审计委员会依据战略定位的治理能力越强、越符合绿色战略发展要求，则越能在顶层战略及业务监督上增强银行全面风险管理能力。这些都是当前及未来银行业审计委员会如何在绿色金融发展背景下充分发挥治理能力以实现提效增速的路径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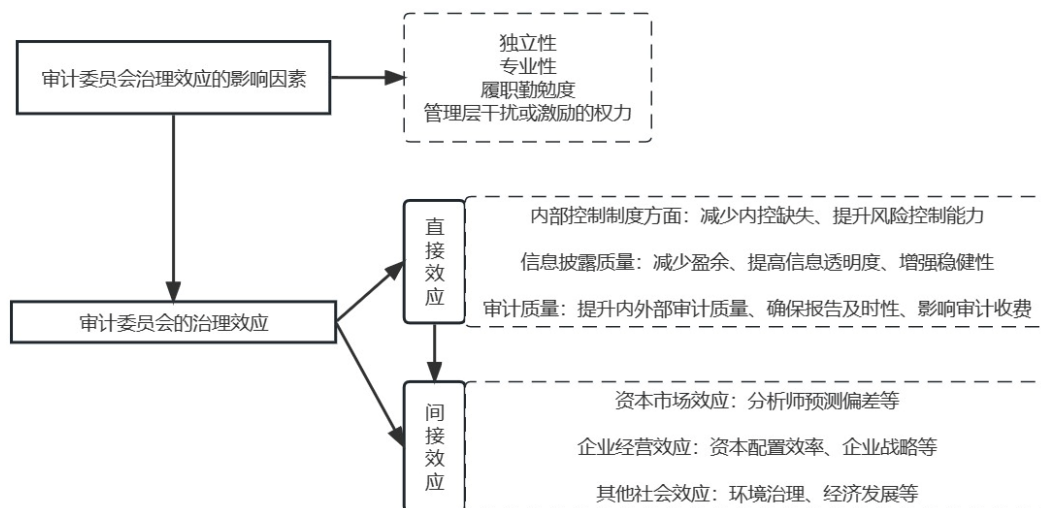


图 3-1 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应以及影响绿色金融的方式

3.5 评价银行绿色金融效果指标选择

3.5.1 审计委员会治理能力评价指标

审计委员会特征及治理能力描述参考相关文献中指标的选择方式，其大多分为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治理行为活跃性（刘彬，2014；谢海娟等，2016；李刚等，2022），其中受到广泛认可的是以 Al-ahdal *et al.*（2020）为代表所构建的审计委员会指数，该评价指数由 9 个审计委员会特征虚拟变量组成。

有效的审计委员会可以通过监督内部控制制度及重大关联交易、指导内部审计集中化垂直化管理落实、选聘外部审计机构、整合内外审计资源及效果、提升信息披露质量等，降低机会主义、短视主义行为，提升直接治理效果。如今在举国上下向“3060”目标奋进的大环境下，全行业均在为建成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体系不断升级转型。审计委员会的职责也相应扩展，一方面需要提升多元复合化的专业能力，为不断向绿色转型的管理层决策提供适时建议；另一方面需要培养可持续发展理念，增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以提升有关绿色方面的间接治理表现。

本文以审计委员会结构特征评价独立性特征，参考《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第 35 条提到“已经提名非独立董事的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得再提名独立董事”和新《公司法》中对审计委员会最小行权规模的要求，选定定量评价指标为

“独立非执行董事占审计委员会比例”和“审计委员会规模”。

专业胜任能力方面，本文参考《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第 107 条要求“审计委员会会议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才”和《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第二章“组织管理”和第五章“内控管理与信息披露”中的要求，选定定性定量评价指标为“审计委员会成员职业背景”、“审计委员会成员受教育程度及教授任职情况”和“审计委员会成员专业背景复合性”。

治理行为活跃性方面，本文参考《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第 41 条规定“独立董事应勤勉尽责”及第 42 条指明“独立董事若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则可被视为未能勤勉履行职责而进行职务罢免”以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第 6 条中明确规定“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五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选定定量评价指标为“审计委员会年度会议次数”、“会议实际出席率”和“声誉（审计委员会成员兼任董事及同企业其他委员会数量）”。

3.5.2 银行风险控制评价指标

“十四五”期间在面临前疫情时代带来的经济下行连锁反应的压力下，我国仍需进行全产业生产方式、发展结构转型。“十四五”规划公布阐释出我国产业发展结构的五大趋势：一是扭转动荡国际经济局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浪潮下，我国一方面应把握住新时代的机遇另一方面亟待正视并解决全球分工大洗牌的挑战；二是突破国内经济内循环的需求规模化增长曲线的瓶颈，推动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三是整合产业链高级发展特征，推动产业竞争格局进行布局调整；四是放宽科创产业融资渠道，助力中国化科技革命转型渗透至各行业以助推全产业数字化生产方式和生产理念转变；五是正视我国过去轻资源可持续化重传统生产的错误发展观念，同时在面临绿色生产方式转变的进程中稳步推进。

然而，近年受到新冠肺炎病毒影响、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波动、房地产市场大调整、国际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全面加大。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短期存在集中释放现象，房地产行业违约频发、债券市场违约现象等在资金层面对经济市场流动性造成急剧压力，预计将对当前经济阶段可承受能力提出挑战。同时全球供应链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步骤加快、绿色贸易产业投资门槛提升等碳中和产业转型发展方面的困难给我国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新格局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根据银保监公布统计数据来看，2015 年-2021 年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 19,624.4 亿元、21,935.7 亿元、23,892.2 亿元、28,426.2 亿元、31,924.1

亿元、34,740 亿元、36,301 亿元,不良贷款率保持在平稳态势分别为 1.9%、1.9%、1.9%、2.0%、2.0%、1.9%、1.8%。然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在 2015-2021 年保持较高水平,2015-2020 年分别为 12,744.2 亿元、15,122.5 亿元、17,057 亿元、20,235.7 亿元、24,134.7 亿元、27,014.8 亿元,2021 年则超过 2.8 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增长速度也高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总体水平,涨幅平均在 17%上下且存在较大波动幅度。该数据可以佐证上文提到中国经济当前存在宏观系统性风险波动上升现象,同时宽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措施下,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和银行业在后疫情时代下输入性通胀对供应链冲击等因素极易导致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爆发。

表 3-1 银行业与商业银行 2015 年-2021 年不良贷款情况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银行业 金融机 构	不良贷款余额/亿	19,624.4	21,935.7	23,892.2	28,426.2	31,924.1	34,740	36,301
	不良贷款余额		11.78	8.92	18.98	12.31	8.82	4.49
	同比增速%							
	不良贷款率%	1.9	1.9	1.9	2	2	1.9	1.8
商业 银行	不良贷款余额/亿	12,744.2	15,122.5	17,057	20,235.7	24,134.7	27,014.8	28,490
	不良贷款余额		18.66	12.79	18.64	19.27	11.93	5.46
	同比增速%							
	不良贷款率%	1.7	1.7	1.7	1.8	1.9	1.8	1.73

数据来源:银监会

其次,本文研究目的围绕银行绿色金融表现,也体现于反映银行风险控制效果中。本文考虑了后文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以后,主要参考了全球银行业监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标准——《巴塞尔资本协议》中的一些指标作为银行风险评价指标。

自 1982 年十国集团达成《巴塞尔协议 I》统一了资本监管标准以风险导向理念为主心骨,到 2004 年《巴塞尔协议 II》进一步围绕外部监管、市场约束、资本充足率三大核心方向建立的风险导向监管体系,再到 2017 年 12 月公布且要求于 2023 年 1 月将全球实施的《巴塞尔协议 III》上调了资本金比率,巴塞尔委员会始终全面贯彻风险导向理念建立加权风险的资产监管体系。在《巴塞尔协议 I》中强调资本充足率意义。而最新的《巴塞尔协议 III》对体现全面风险管理的

总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还建议各银行应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

我国证监会对标国际资本监管要求早在 2011 年即布局我国资本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要求先于且严格于《巴塞尔协议III》。因此，不管从全球银行风险监管体系，还是我国与时俱进高要求的银行监管标准，均能看出当前全球金融业对风险管理的重视以及风险监管力度的加强，全球银行业发展形势存在一定压力。

2021 年 6 月《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中有关绿色金融业务风险的评价在风险导向的基础上考虑选用绝对值变动数据，如不良绿色贷款余额和非标违约的绿色债券余额。结合银行业当前利润主要仍来自于贷款业务的现状，本文预期未来银行贷款业务中绿色信贷占总贷款比将在政策引导下不断扩大。因此，选用和绿色信贷不良贷款率紧密相关的不良贷款率及相关相对值变化指标作为观测指标。

综上，本文选择如下定量指标、相对值变化指标作为反映银行业公司治理效果指标，分别为“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额及其增速”“拨备覆盖率”，以此 3 个指标窥探资本质量抵御信用风险的绩效。一方面根据《巴塞尔协议》要求及银行业协会排名、对比惯用指标；另一方面，本文主要研究的绿色金融业务表现的最新指导文件中对定量指标“绿色贷款不良率”有一定要求。本文旨在研究率先进军且领先行业的绿色银行，因此借用传统的资本质量指标窥探公司治理全貌。

其中“不良贷款率”是不包括正常类贷款和关注类贷款的贷款总额与各类贷款总额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的比率，该比率原则上越低越能表示银行做好了信用风险管理。“拨备覆盖率”为一般准备金、专项准备金、特种准备金之和与不良贷款总额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的比率，作为一级指标原则上要求“拨备覆盖率”不低于“不良贷款率”才能保证有充足的准备金抵御不良贷款损失风险，即“拨备覆盖率”不低于 100%，然而该指标并非越高越好。财政部要求拨备覆盖率由静态要求高于 150%调整为动态下限位于 120%-150%区间标准，该指标用以反映商业银行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的风险抵御水平和经营稳健态势。拨备覆盖率上限原则上保持在 2 倍为佳，因为留存准备金以确保信贷风险管理固然重要，但过多的准备金计提时有必要结合资产质量实际情况考虑是否存在资金配置效率降低、准备金覆盖过度、平滑利润的动机。

3.3.3 绿色金融评价指标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发展理念为先的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转型关键期,不仅该发展理念纳入了国家战略制定体系中,政策和市场等外部力量均推动着传统产业转型绿色和绿色产业自行发展所衍生的“贴绿”融资需求日益强劲,外部推力和内部动力均使得“绿色金融”成为银行业为主的金融机构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本文研究目的围绕银行绿色金融表现,除了绿色信贷的不良贷款率和绿色债券的违约率等定量表现,其定性指标的披露也体现了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

2014年6月公布的《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是银保监会首次公开表态支持以较为统一标准对银行业绿色信贷实施自评价,到2015年9月国务院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首次公开提出绿色金融体系战略——标志绿色金融在国家战略层面稳扎根系,到2021年1月财政部公布《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中要求采用以行业对标和历史对标组织的综合对标评价方法展开对绿色信贷业务定性定量考核评价,再到最新202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评价方案》中扩大定性定量考核指标至绿色金融范围的评价体系,均能看出我国正不断完善配套当前绿色金融发展的市场环境和良好政策。

表 3-2 银行业绿色金融评价办法相关文件

公布时间	公布机构	文件	相关内容
2014年6月	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	《绿色信贷实施情况 关键评价指标》	围绕绿色信贷业务以定性结合定量方式制定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一是从战略层面支持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二是从组织管理、业务流程加强E和S风险管理,三是采取综合措施提升E和S表现。
2017年12月	中国银行 业协会	《中国银行业绿色银 行评价实施方案(试 行)》	建立绿色银行打分体系,考虑五类定性指标(组织管理、流程管理、政策制度能力建设、内控和信息披露、监督检查)赋以权重计算,并选取2项综合定量指标作额外加分项。
2018年7月	中央人民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	要求24家主要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

公布时间	公布机构	文件	相关内容
	银行	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方案（试行）》	构进行每年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工作，并构建 80%权重定量指标+20%权重定性指标的评价体系。定量指标围绕绿色贷款余额占比、增长速度、不良贷款率等 5 项，定性指标围绕政策及制度执行情况。
2021 年 1 月	财政部	《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	评价体系采取 100%定量指标，考虑服务生态文明战略情况且占 6%考核权重，具体表现为以综合对标方法计算绿色信贷占比*100%
2021 年 6 月	中央人民银行	《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	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纲领性文件，主要围绕绿色金融主体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大力发展并考核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为主的绿色金融业务，二是提升银行主体至 ESG 的三维度责任，三是引导发展提升综合风险管理能力。
2022 年 6 月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	三大着力点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一是从战略高度布局“1+N”的绿色金融发展思路，二是将 ESG 风险管理能力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三是构建有利于绿色金融发展的外部监管环境。

数据来源：各公开网站整理

根据央行最新设计提出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显示，定量指标包括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占比、绿色金融业务同比增速、绿色金融业务风险总额占比、绿色金融业务总额份额占比 4 类同权重指标，并考虑到顶层设计结合我国当前绿色金融市场主要围绕在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两类融资产品，指出可以以绿色贷款余额和绿色债券持有余额映射绿色金融业务表现，也从侧面展现出当前我国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发展脚步较慢，对待绿色金融新品种的监管措施仍处于初步设计阶段。

因此，考虑到除了 24 家主要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发展存在不均衡态势，在描述性统计 2021 年银行业绿色金融的指标中，本文选择如下定性定量

指标，分别为“绿色信贷余额及同比增长率”“绿色信贷余额占总贷款余额比”“是否披露绿色债券信息”。由于兴业银行已建立较为多样、丰富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自愿性信息披露绝对篇幅和相对段落质量均较高，因此在具体案例分析中选用“绿色金融余额”“绿色金融余额占比”“绿色金融余额同比增长”3个指标探究案例公司的绿色金融治理表现。

4.我国上市银行审计委员会与绿色金融描述性统计

在2021年A股市场上42家上市银行中剔除5家未披露绿色信贷业务余额及同比增速的银行，以剩余37家A股上市银行为描述统计样本，对我国银行业审计委员会特征、绿色金融发展做描述性统计。首先可以得知当前我国88.10%的银行在自愿性信息披露方面履行了一定的职责。

4.1 上市银行审计委员会特征描述

表 4-1 2021 年 37 家 A 股上市银行审计委员会治理能力统计

类型	独立性		专业胜任能力			治理行为活跃性			实际出席率
	规模	独董占比	本科以上学历	教授	专业背景	声誉 I ⁵	声誉 II ⁶	审计委员会召开次数	
国有大型银行	6.17	64.76%	88.17%	2.00	91.67%	8.00	13.83	5.83	92.08%
股份制银行	5.56	67.28%	89.01%	2.44	95.37%	13.22	11.22	7.33	97.97%
城商行	4.54	63.65%	73.40%	1.23	98.46%	9.62	9.23	6.31	98.33%
农商行	3.89	54.07%	58.52%	1.44	96.30%	7.11	4.78	5.11	98.13%
合计	4.89	62.39%	75.97%	1.70	96.08%	9.62	9.38	6.19	97.18%

⁵ 此处声誉 I 指的是该独立董事兼任其他公司董事情况

⁶ 此处声誉 II 指的是该独立董事兼任本公司其他专业委员会情况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08054113015006023>